

九四



南陵縣文史資料選編

第二輯

83



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南陵縣委員會編

74243/06

编 者 的 话

文史资料工作是爱国统一战线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一项促进祖国大团结、大统一，进行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并惠及后代的重要工作。在县委的领导和各界有关人士的支持下，今年我们征集、整理并汇编了《南陵县文史资料选编》（第二辑），供有关单位和人士研究参考，并请提出宝贵意见，以便不断改进和提高。

文史资料征集的范围，包括戊戌变法以来截至“文化大革命”前有关政治、军事、经济、文化、民族、宗教、华侨、社会生活等各个方面的资料。我们欢迎大家撰写亲历、亲见、亲闻的上述史料，踊跃来稿，继续给予支持。

今后，我们将一如既往地县委领导下，坚持高举爱国主义旗帜的方向，继续贯彻实事求是的原则，发动群众，依靠群众，做好规划，认真确定重点文史选题，努力提高文史资料质量，以开创文史工作新的局面。

一九八三年十一月三十日

目 录

新四军军部在土塘·····	县文史室编 (1)
任弼时同志在南陵被捕经过·····	纪自友 (9)
接迎战友破重围·····	田明清 高正木口述 (15)
我给渡江先遣队当向导·····	何道成口述 (19)
马仁渡伏击战·····	丁志仁 (25)
汉奸张昌德及其“独立方面军”·····	县文史室编 (27)
南陵早期教育发展情况	
和几次学潮纪实·····	县文史室综合整理 (47)
南陵早期教育情况补记·····	张 珏 (84)
附：抗战前的县体育场和文化馆·····	伍白丁 (86)
解放前南陵五大财团·····	县文史室综合整理 (87)
朱云谷堂	
朱继范堂	
江三立堂	
吴维政堂	
徐宝经堂	
附：朱长济当铺概况·····	朱晋谦 (105)

新四军军部在土圪

县 文 史 室

一九三八年农历五月初三，新四军军部在军长叶挺同志率领下，东进抗日，离开了歙县岩寺，来到地处丘陵地带的南陵县土圪村。同年六月初六，军部迁往距土圪十五华里的泾县云岭。土圪接着又迎来了由傅秋涛、江渭清同志率领的一支队老一团。四十五年过去了，但当年那火红的日子却深深铭刻在土圪人民的心中。人们怀念着曾与他们朝夕相处的首长和指战员们，传颂着新四军抗日将士发动民众、英勇杀敌的动人事迹，缅怀着为国家为民族壮烈献身的革命先烈。深厚的情谊，光荣的传统，代代相传，万古留芳。

人民军队

饱经历史战祸的土圪群众，历来把兵害匪患视同洪水猛兽。抗战开始后，国民党的五十二师、一百零八师、一四四师先后来过土圪，其中以范子英的一四四师驻扎的最久。他们抗日不行，坑民却非常厉害。要粮草，抓壮丁，穷凶恶极。每户每三天就要摊派一名夫子，给士兵们无偿地挑子弹挑行李，给长官太太们抬花杠。在这苦难的日子里，人们暗中传说在江西有一支名叫红军的部队，这是共产党领导的穷苦人自己的部队。至于这支部队是什么样子，谁也没有亲眼看见过。

一九三八年农历四月，新四军第一支队教导队教导员胡大

鹏，带着三个身穿灰布军装的副官，骑着骡子来到吕山，找到当时任甲长的顾正明。顾正明询问他们是什么部队，胡大鹏同志说是国共合作的新编第四军。部队不久就要来，他是先来请当地人士协助安排住房的。顾正明介绍他们到有两间楼房的土圪去，自己并不敢陪同。回到家里，顾正明的父亲告诫正明说：“是非天天有，不听自然无”。你能摸清他们是什么人？受够了国民党军队祸害的群众，哪敢打听，避而远之，耽心惹祸。

农历五月初三，土圪一带群众看到大队人马开来，家家惊慌不已，青年男女全都纷纷离家躲避。妇女们集中隐蔽在大祠堂里，不敢露面。然而，兵来之后，村子里却出奇地平静。胆子大的人出来看看，只见这些当兵的正在帮他们扫院子，收拾猪圈鸡笼，屋里没留人的人家，门依然反掩着，战士们宁可在屋檐下宿营，也不进屋去。当时腿上患了肿毒而未走的农民陶方义，正惊恐不定的时候，一个战士走上前来，亲切地问他为什么不去医治，并马上送他到部队卫生队包扎上药。第二天，陶方义买了只鸡要去谢情，部队说什么也不收，说：“我们是新四军，是红军，人民的军队，和老百姓是一家人。”消息传开了，人们放心了，纷纷赶回村，热情地接待心目中向往已久的自己军队。

不几日，军部召开盛大酒宴，挨户邀请群众赴宴。宴席上，部队领导向土圪人民一再致谢，并宣传抗日道理和新四军的纪律，以及与老百姓的军民关系。人们为终于盼来了亲人而高兴万分。军民频频举杯开怀畅谈。

这时随邓子恢同志住在古城上金村的战地服务团文工团，为群众开展了丰富多采的文艺宣传活动。他（她）们搭土台，挂汽灯，在沈亚威同志的指挥下，唱歌、演话剧，启发群众的

阶级觉悟，激发抗日热情。女团员洪琪、王根、蔡大姐等同志当年活跃在舞台和民众之间的情景，至今仍为老一辈人所津津乐道。

文工团宣传的方式，完全符合当时群众识字不多的特点。他（她）们多采用漫画、活报剧和上广播讲演的形式，还开展了教唱歌活动。群众易懂易记。象《新四军军歌》、《大刀进行曲》、《三大纪律八项注意》连同《松花江上》等歌，一时广为流行。

部队除出操、训练和执行军事任务外，就修桥补路，帮助群众做好事。安吉和土圻的各条小路，原先杂草荆棘丛生，部队来后，铲除得光光净净；麦子登场之时，战士们帮着抢收抢打；村前村后的环境卫生，天天都有驻军值班打扫。住有军队的人家，柴草和饮水几乎都由战士包下，无须房东费神。群众发自内心地说：“开天辟地哪有这样好的军队！真是人民的子弟兵啊！”

组织起来

新四军来到土圻，不上十天，军民就打成一片，建立了深厚的感情。人们亲眼见到，这支军队除了在操场、战场、课堂，平时分不清谁是官谁是兵。大家同吃、同住、同劳动、同游戏，官兵一律平等。在平日交谈中，人们知道，这支部队是来自八省的革命青年，还有的是来自海外的爱国侨胞。他（她）们中不少人是很有才华的知识分子，为了抗日，为了革命，离开了家乡亲人，抛弃了温暖舒适的生活环境，穿上了军装，奔赴第一线来了。住土圻的一个姓唐的股长，还懂得多国文字，有一回来了两个外国友人，就是他陪同接待的。

在部队的宣传和实际行动感召下，当民运部派陈洪同志来搞群众组织发动工作时，人们纷纷报名参加。十八岁至四十五岁的中青年，参加地方民兵组织自卫队。十八岁以下的少年儿童组织儿童团。同时，还分别组织了农抗会、妇抗会、青抗会。除极个别大富户未获准参加外，土塘一带参加抗日群众组织的有一千多人，占人口的99%，三里等地参加的人更多。曾参加过儿童团的徐正国同志回忆说：当时自己去报名，部队还不同意，非得家长带着报名部队才批准。组织起来后，儿童团担任放哨、盘查过往陌生行人和配合部队开展文艺宣传鼓动工作；自卫队担负配合部队侦察、组织担架队、运输队，接受军训，协同作战；妇抗会还担负了做军鞋，护理伤病员等工作。

老自卫队员们回忆，当时部队对自卫队非常关心和爱护。开会、演戏，自卫队坐前面，坐中间，而部队则站后面站两边。开会会餐时，战士们按标准每桌共用一个菜盘，而自卫队员每桌有三盘菜。

一九三八年秋，陈毅同志也来到土塘，住在吕山一所公堂屋内。临走时，顾正明同志一直把他送到竹坑小河沿。陈毅同志说他要到苏北敌后，他很关心自卫队的组织和发展。在他的动员下，顾的弟弟顾正斗光荣入伍到军部参加了工作。

一九四〇年，日寇两次进犯土塘村，自卫队奋起参战，担负了带路、放哨、抬送伤员和前线阻击任务。日寇见我自卫队土枪土铳打响，一时惊慌，不知是什么新式武器。

当皖南事变发生前夕，我新四军被迫撤离时，许多自卫队员参军入伍。仅土塘村就走了几十名，有七人在事变中壮烈牺牲。

欢送军长

叶挺军长当时住在土塘徐恩禄家。他平易近人，下午常到涌珠泉来洗澡，从不设岗布哨，过路老百姓都跟他亲切招呼。他在土塘一共召开过两次群众大会，一次是一九三八年五月庆祝“五一”国际劳动节，发表节日祝贺和宣传抗日救亡，一次是主持祝捷大会。当时在土塘，人们都见过他，听过他的讲话。他常穿一套灰布军装，佩戴整齐。有时也穿西服，戴共和帽，手提手杖。他话语不多，简短有力，常和江渭清同志一道来到群众中间，与群众亲切交谈。

同年农历六月初六，因土塘大旱缺水，部队生活不便，加上离公路太近等原因，军部移驻泾县云岭。当老百姓得知叶军长要离开时，依依不舍，纷纷商谈组织欢送。六月初六这一天早晨，数百名群众自发地敲着锣鼓、带着鞭炮，还抬了两乘轿子来军部送军长去云岭。不料副官告知，叶军长料到群众来送，不便扰劳，所以清晨就动身去了。为了免去欢送，叶军长还特意和马夫换了衣服，让马夫骑着马，自己步行执缰，一步步走向新四军新的军部——云岭村。群众懊悔来迟了，执意要去云岭见一见军长。轿子就便抬了两个伤病员，敲锣打鼓来到云岭。那知此时叶军长已在部队大礼堂，正在主持会议呢。当下叶军长得知，因会议离不开身，便嘱副官向群众致谢，并热情接待。土塘来的群众被挽留吃了顿酒，每人还发给两角“小牛票”，说是补偿一天的劳动。人们至今还无限深情地说：“我们的叶挺军长跟我们真是心连心，一家人。”

英勇抗战建奇勋

新四军军部来到土塘、云岭后，在宣传发动民众抗日救亡的同时，英勇抗击日寇。老百姓常可看到我新四军健儿从前线押下三三两两的日军俘虏和缴获的日本枪炮。一九三九年，驻在南陵、繁昌一带的我新四军三支队取得的繁昌反扫荡胜利，文工队立即谱写了歌曲《血战繁昌》，在土塘广为传唱。其歌词有：“反扫荡，反扫荡，一年大捷，血战繁昌，壮烈牺牲我吴副团长（指三支队六团副团长吴焜同志）……”一九三九年在土塘附近发生的两次较大规模的对日作战，其激烈的战斗情景，我新四军健儿前赴后继的献身精神，至今仍为人们所赞颂。

第一次战斗发生于一九四〇年农历三月十九日。当时傅秋涛、江渭清同志领导的老一团住在土塘，张钰秀、丁银章同志率领的新一团住在安吉。据老人汤雨林同志回忆说：日寇出动兵力二千余人，其一路四百余众由汉奸丁发元带路，于十八日进犯三里店，妄图骚扰我云岭军部。十九日日寇飞机多架先行轰炸我老一团团部。飞机来临之前，我号兵闻声吹号报警，部队战士立即出动，挨门逐户将群众护送到山洞隐蔽。飞机在土塘投下三枚炸弹，群众无一伤亡。九点钟，日寇骑兵由三里米计冲向我土塘第一道屏障父子岭进攻。汤雨林在路上遇到我正在执行任务的侦察连连长孔诚，便跟了前去。孔诚从望远镜中发现鬼子兵时，即派通讯员去土塘团部报告。我新兵营在营长汪星华的率领下，以及闻讯由金坑赶到的一个连，于父子岭奋勇反击，在车山展开激战。敌人依仗空中飞机掩护和优势装备，狂轰滥炸，轮番进攻。而我据山固守，战斗空前激烈，敌人伤

亡累累，始终不得越前一步。血战八个小时，敌人伤亡三百七十余人。日寇见攻势受挫，惧怕被我围歼，拖着伤兵、尸体仓皇向烟墩、青阳方向溃逃。残敌途经大坟山时，山上有我一名受伤战士，他见山下有四十余日寇骑兵，便甩出最后一颗手榴弹，炸死炸伤敌骑多名，自己壮烈牺牲。乡亲们被他的大无畏精神深深感动，为这名无名英雄筑坟立碑，永世供人扫祭。第二天听说日寇将其伤员及尸体放火焚毁，败退远去。

父子岭战斗结束，农抗、妇抗、青抗分别召开了会议，对战斗进行了总结。之后，叶挺军长主持召开了隆重的祝捷大会。

会议邀请了许多地方进步士绅参加。大家济济一堂，庆祝胜利。许多地方人士深为我新四军的英勇气概所感动，当场踊跃挥毫题字，发表演讲。其中有的题道：“英勇杀敌，大快人心。”有的题着：

“新四军坐镇皖南，
老百姓高枕无忧。”

文工队唱着刚谱写的《战斗在父子岭》歌曲，人们高呼着“发动江南游击队，扩大人民自卫军”的口号，整个会场洋溢着军民抗日豪情，显示着必胜的信心。

第二次大的战斗发生于同年农历九月初九。日寇为进犯我云岭军部，出动了总兵力一万多人，其中一路二千七百余人的步骑兵，由泾县北贡一个麻子汉奸引路，从三里草鞋店，经竹坑向云岭进攻。这次战斗，叶挺军长亲临前线指挥。日寇沿途纵火，狂轰滥炸。我饶惠堂营长率队于前敌阻击，引路的汉奸刚摸上山口，即被我一枪击毙。老一团扼守蜈蚣岭，血战两天一夜，敌伤亡累累，寸步难行。军部凡能参战的人员全部上了火线。在我军民合力痛击下，日寇损失惨重，被迫转向汀潭和

大岭脚败退，而我部紧追不放，此路前后歼敌六百余人。剩下不到百人的日寇弹尽粮绝，窜至小岭国民党五十二师防区。但五十二围堵缓慢，日寇又派遣四十二架飞机猛烈轰炸，打开缺口，致使残敌得以从泾县往宣城方向逃逸。此战，我方由于军民协力，英勇抗击，缴获甚多，日寇几遭全歼。自此再不敢复来。

新四军在皖南发动民众、浴血抗日的英勇事迹，却遭到消极抗日积极反共的国民党反动派的嫉恨。一九四〇年开始，他们不断制造摩擦，多方限制我抗日活动，甚至逮捕和暗害我零散执行任务的同志。一九四一年元月，当我新四军为顾全大局撤离皖南北上时，何应钦、顾祝同之流秘密调遣八万兵力，围歼我新四军健儿，制造了震惊中外的皖南事变。

事变发生前夕，江渭清同志代表军部在土塘、安吉召开告别皖南父老大会。文工团演出了反映被迫北上的话剧，演至高潮处，那悲壮的剧情，强烈的情感，使许多人热泪迸发。江渭清同志在讲话中沉痛地指出：“何应钦要我们过长江，是要我们去呛水！同志们，春节快来了，当你们吃年夜饭的时候，也许是我们吃枪炮弹药的时候。”他最后庄重地喊道：“我们新四军走了，但我们共产党是永远不会走的！”

是的，皖南事变后，尽管国民党残酷实行白色恐怖，但广大群众并没有屈服，地下火种依然熊熊燃烧，在以后的抗日斗争和解放战争中，浸透着我军民鲜血的土塘群山，一直是敌人惧怕的红色革命根据地。

（根据土塘老自卫队员、妇抗会员、儿童团员座谈会发言整理）

回忆任弼时同志在南陵被捕的经过

纪 自 友

一九二八年九月（具体日期记不清），任弼时同志以中央特派员身份来安徽视察。当时中共安徽省委、共青团安徽特委均设在芜湖。省委书记是王竞博（即尹宽，后加入了托陈派）、团特委书记是林植夫（福建人）。任弼时同志到芜湖时住在洋船码头附近的大方客栈，嘴上留有一撮胡子，因此，大家都称他为小胡子。

任弼时同志来安徽，是为了解决中共安徽省委与团特委之间的纠纷。省委负责人尹宽、王教等人批评团有代替党的趋向，搞先锋主义；团特委林植夫、俞昌准等同志则认为省委过于保守，不敢大胆发动群众向国民党进行斗争。俞昌准同志并受到省委停止他工作的处分。这一情况反映到党中央以后，中央便派遣任弼时同志前来安徽。弼时同志首先听取了安徽党团负责同志的工作汇报和意见，然后在大方客栈召开了部分党团骨干会议，进一步了解安徽党团工作的具体情况。他肯定了团特委对省委的意见，恢复了俞昌准的特委工作，对省委组织作了部分调整，将王教调离了省委机构。弼时同志在骨干会议上分析了当时全国革命形势。他指出：中国革命正处于两个高潮之间，国民党看来貌似强大，其实它是虚弱的。它对革命运动的疯狂镇压，对革命者的残酷迫害，就是它虚弱、恐惧的表现。被压迫的工农大众总是要革命的，也绝不可能被斩尽杀绝。“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我们只要能够深入群众，大胆领导，根据不同对象的切身利益要求，分别提出适当的经

济、政治口号，引导他们进行斗争，逐步提高他们的阶级觉悟，我们就可以促使新的革命高潮迅速到来。弼时同志的精辟分析，使同志们明确了方向，鼓舞了斗志，坚定了信心，使安教党团工作获得了新的活力。

南陵紧邻芜湖，一九二五年就有党团员二十余人（多为在上海、芜湖读书的大中学生）。一九二七年南陵遭到严重水灾，是年冬，在南陵、芜湖党团组织的领导下，曾于芜、南接壤处举行了一次农民武装起义——白沙圩农民暴动。这次起义虽然失败了，但却扩大了党的影响，使南陵广大劳动人民认识到共产党是代表他们利益的政党。一九二八年春，南陵党团县委正式成立。党委书记是王德泽，县团委书记是汪正芳。王德泽在县委成立不久被捕，党团的领导工作由汪正芳一人担当。这一年是大灾后的第一年，群众生活仍较艰苦，易于发动，而党团组织也有一定的基础。根据这一情况，任弼时同志建议省党团委对南陵工作必须加强领导，并要亲赴南陵视察，俾能作出具体部署。

任弼时同志在芜湖期间，适逢辛亥革命纪念日来临，国民党把这一天作为国庆日，名之为“双十节”，每年都要大搞庆祝活动。当时全国革命正处于低潮，反动势力十分猖獗。芜湖的环境同全国一样，也是非常恶劣的。为了揭穿国民党反革命的真面目，鼓舞同志们的斗志，唤起人民的觉悟，重新组织强大的革命力量，任弼时同志指示党团组织利用敌人进行纪念活动时，在会场上，在游行队伍中散发张贴了大量传单、口号和标语，弄得敌人狼狈不堪，恐慌万分。“双十节”的第三天，任弼时同志在团特委书记林植夫同志的陪同下，便向南陵出发。

任弼时同志来南陵行前，把嘴上那一小撮胡子剃掉了，并化名为胡少甫。林植夫同志化名叫徐厚昌。他俩都是商人打

扮，身穿长袍，头戴礼帽，随身只带一只手提小皮箱。我当时在安徽省立第二中学职业学校读书。这所学校是由省立第二甲种农业学校和省立甲种商业学校合并而成的。二农的前身就是有名的具有革命传统的省立安徽公学。我是这所学校的团支部负责人，并兼芜湖市东区共青团区委书记。因为我和团特委的俞昌准同志都是南陵人，对南陵情况和到南陵的路线都比较熟悉，任弼时同志和林植夫同志动身的那天，便由我俩送行。那时芜湖至南陵交通很不方便，只有一条漳河可通小轮。秋天一到，河水下落，小轮就不能通航了，旅客只有到石碇镇乘夜行船。我们送了十华里路，到了卡子口，便分了手。任弼时同志和林植夫同志在石碇镇搭乘夜行船，于次日（即十四日）清晨到达南陵的滨土壩，步行五华里路抵南陵县城。

任弼时同志和林植夫同志当即在南美旅馆住下，找到了团县委书记汪正芳。为了解南陵党团基层组织情况，任弼时同志决定亲自参加一次党团组织的支部会议。会议地址确定在香由寺。那时候南陵县城墙还没有拆毁，香由寺是一座古庙，座落在城内的西北角，背后紧靠城墙，庙东南角有一座小乔墓（小乔是三国东吴都督周瑜的夫人）。一道小溪横贯在庙的南面，只有两座石桥——金桥、银桥可通庙内。这所古庙没有神象，地处偏僻，平时没有人烧香，也没有什么游人，所以选在这儿召开会议是比较合适的。

支部会议定在第二天上午召开，由汪正芳负责召集。届时，汪正芳领着任弼时同志和林植夫同志先去香由寺，他俩假作游览凭吊小乔墓的样子留在那儿，汪正芳则去通知其他同志前来开会。

汪正芳走后，应约到香由寺的有两个团员，一个叫刘显忠，一个叫王德辉。他俩赴会路过夫子庙（现在城关五小）的

后大殿时（去香由寺必经之路，那时大殿是南陵伪县党部所在地）。被伪县党部秘书胡学礼看见。胡原是共青团员，一九二七年大革命失败后，全国革命处于低潮之际，胡叛变投敌，捞了一个南陵伪县党部秘书职位。现在他看到刘显忠、王德辉到香由寺去，估计一定是开会去（当时的支部会大都是在旷野召开，胡学礼是有这个经历的）。于是他立即报告了伪县党部。伪县党部派伪县工会主席许锦章带领十几个荷枪实弹的伪自卫队士兵，前往香由寺拘捕开会人。伪自卫队先封锁了金桥、银桥，任弼时等同志发现情况不妙，但也无法摆脱困境，因而不幸全部被捕。汪正芳在邀集其他同志来开会的途中，听说出了问题，就立即制止了其他同志赴会，当晚他便乘夜行船来到芜湖，次日上午到第二中等职业学校找到我，要我把这个情况报告组织。我和汪正芳谈了几句话以后，便去上课了。他一人留在我寝室内。一节课还未下，突然一位工友（他是团员，姓名回忆不起来）靠近教室门口，以目示意我出来。我出了教室，这位工友告诉我说：有人跟踪汪正芳，在我寝室里逮捕了他，叫我马上离开学校。因此我丢掉了在学校的所有一切，立即离开了学校，在花街5号（团特委接头处）找到俞昌淮同志。我向他报告了任弼时同志等人被捕情况。至此，任弼时同志一案被捕有五人。

任弼时、林植夫同志等四人，在香由寺被捕后即解至伪县党部。伪县党部组织部长刘怡亭（一九二六年参加共产党，大革命失败后叛变，后不久又在安庆告密逮捕了俞昌淮同志）对四人分别进行搜身、审讯，除在任弼时同志身上搜出大洋八十元，别无所获，遂将他们送伪县政府监狱羁押。次日晚，伪县政府会同伪县党部在伪县政府法庭进行审讯。主审人是伪县长王粹民。伪县党部参加会审的有伪党部常委刘祖禹，牧文龙（

叛徒)组织部长刘怡亭,宣传部长罗远波,训练部长罗绍英,伪党部干事刘必昌、胡学礼(刘、胡都是叛徒)陪审,伪县党部秘书徐兆熊、伪县政府录事李文波二人记录。王粹民、牧文龙、刘祖禹坐于前排,其余均坐后排。先提审刘显忠,接着审讯王德辉,他俩受刑后,均供称是共青团员,是到香由寺开会的,并供认任弼时、林植夫俩同志是上级组织派来的共产党员。继而审讯林植夫同志,林植夫同志为了掩护任弼时同志,承认自己是共产党员,但绝不承认任弼时同志,说和他相识,也是在小乔墓前偶遇的。

任弼时同志被最后提审。他临危不惧,镇定自若,神态安详,沉着应付。他说名叫胡少育,是由湖南来南陵做生意的,到香由寺去是为了游览小乔墓,不知犯了何法把他抓来。敌人无隙可乘,命令警长张勇拿来刑具,由法警郭凤,周发给任弼时同志上镣铐。面对酷刑,任弼时同志大义凛然地对敌人说:你们踩死我,我也没有什么可供的。一个政党不应该摧残人的身体,否则,就不是光明的党。在审讯中,叛徒刘怡亭多次向任弼时同志提出一连串的问题,企图从任弼时同志回答中找出破绽,但都被任弼时同志机智地应付过去了。隔天又审讯一次,尽管敌人严刑拷打,使他几经昏厥,但弼时同志仍坚定顽强,丝毫没有屈服。敌人无可奈何,只好以嫌疑犯将他收押。那时候,国民党对政治犯的最后审判权是属于省一级法院的。任弼时同志等四人在南陵经过审讯后,被押送到重庆,囚禁于安庆饮马塘看守所。这个看守所共有“知”、“过”、“必”、“改”四个号子。在蒋介石叛变革命后,安徽抓的一批政治犯都集中关在“知”字号,故这“知”字号子便成了反省院。任弼时同志也被关在这个“知”字号子里。

在反省院里,林植夫同志对王德辉和刘显忠做了大量的思

想教育工作，所以王、刘在高等法院开庭时，都翻了原供，说在南陵的供词是在严刑拷打之下，被逼编造的，是假供，并说明他俩不认识任弼时同志。在这同时，任弼时同志受审供词已由安徽党组织报告了党中央。党中央立即采取措施，积极进行营救。因此，安徽高等法院无法查明任弼时同志的真实情况，不得不以罪证不足而释放他出狱。

任弼时同志被释放后，我于一九二九年春在芜湖被捕，也被押送到任弼时同志蹲过的“知”字号。在“号子”里，我得知任弼时同志在狱中积极帮助同志们建立了党团狱中支部。他只和柳毅夫（即柳冶，解放后任教育部副部长），甘天沐（解放后任驻外大使）等个别领导同志发生关系，不参加组织生活。一般同志都不知道他是共产党员，更不知道他就是任弼时同志。任弼时同志对狱中同志的学习和生活极为关心。如对案情较重的同志，帮助学习政治、经济、理论、外语。对案情较轻、刑期可能判的较短的同志，则帮助他们着重学习政治、理论，如阅读河上肇的《经济学大纲》、被格达诺夫的《政治经济学》以及辩证唯物论知识。工农分子则学习文化。在狱中支部的领导下，每星期各个小组都要过一次组织生活，互相帮助。在生活上，同志们家里寄来的钱，其中一部分由一位同志保管，大家共同使用。书籍有吴昆负责保管，轮流借阅。所有这些措施，使狱中同志安定了情绪，发扬了团结互助的精神，提高了阶级觉悟，增强了对敌斗争的信心。

任弼时同志在安徽看守所中虽然关押时间很短，但他一刻也没有放松作为一个无产阶级革命家所应做的工作。